



发掘甲午海战沉舰 考古让历史浮出水面

《归海》讲了一个发生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异国婚恋故事。袁凤是一个重返过去的时光旅行者，不但负责侦破真相，也负责与过去的自己碰面，拥抱并告慰那个随母亲穿行于乱世的小女孩。

□ 韩浩月

《归海》：一段有关时间与历史的漫长旅途

小说家张翎新长篇小说《归海》讲了一个发生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异国婚恋故事。一对中国母女，与一个开办听力诊所的加拿大男人共居于一个屋檐下。母亲袁春雨的猝然长逝，让女儿袁凤对母亲的身世产生好奇。以母亲留下的一箱子为线索，女儿与母亲的姐姐——长住上海的梅姨袁春梅建立了联系，从多伦多到上海再到母亲的故乡温州；从2011年到抗日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地点线与时间线的交织，让一段几乎被埋藏的往事浮出水面，带着呛人的悲苦、怆然气息，扑面而来。

《归海》的故事结构，如同一所玻璃造的房子，全书共分6章，可以视为有着6间房子的存在。作为读者，隔着这间可以看到另外房间的大致景象，但故事中人，因年代不同，被封印在各自的房间。他们的命运，因此很难由点连成线，他们没有一眼就可以看到尽头的人生——固然平凡，但也安稳。他们的一生，被分别切块存放，点一下播放键或者暂停键，都可以看见命运炸裂后的满目破碎景象，以及听到刺痛耳膜的异响。作者选择这样的表达方式，并非为了制造悬念，更多是想形容人在不同困境下的茫然与冲撞，如同被装进玻璃瓶子里的昆虫那样。

袁凤是拆掉这座玻璃房间的人，而赋予她勇气与动力的精神能量来源，在于她拥有了别处的“房间”。52岁的她已经在别处重新构建了强大的自己，她用新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对自己进行了完整的梳理，得到了整理过往的自信，还有面对一切真实的坦然。母亲在世时，不经意间给女儿袁凤准备了一份自带阴影的“遗产”，而找到这份“遗产”的制造地，并彻底地与之切割，则是袁凤终结与母亲“战争”唯一的方法。因此袁凤是一个重返过去的时光旅行者，不但负责侦破真相，也负责与过去的自己碰面，拥抱并告慰那个随母亲穿行于乱世的小女孩。

《归海》使用了蒙太奇的写作手法，其目的在于减缓痛感。如果作者刻意去写疼痛，那么这部长篇将沉溺于伤口与疮疤之中，失去救赎的意义。于是，作者设置了穿插于每章之前的电子邮件通信（袁凤以自己的英文名菲妮丝与丈夫乔治进行的沟通）这一环节，这是一艘可以快速看见现实的休憩之船，也是可以帮助读者消化情节、咽下苦涩的避风之港，提醒自己那不过是一场噩梦，现实一切还好。《归海》是一部写了创伤同时也写到如何面对创伤的小说，这部长篇有着属于自己的呼吸节奏，读者会在作者的带领下，于故事的海底一口气潜游许久之后，会浮出水面吸入氧气，然后继续一段有关时间与历史的漫长旅途。

《归海》的主要情节发生于1940—1980这40年间，但张翎如同填格子一般，将其准确地放置于20—21这两个世纪它该有的位置当中，由此赢得了20—21这自由，如同用3根手指操作iPad屏幕一般，可以随时放大某一个时间段中的历史，并穿透那些由战争、斗争等构成的硝烟与迷雾，看见一张张活生生的面孔，并看见那些面孔中清澈或焦灼的眼神、毛孔中渗透的血或泪痕。在《归海》的群像中，袁春雨的形象会随着小说的讲述而逐渐清晰，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如何穿过命运的大雨，如何不动声色地掩埋青春、重新生长，又如何晚年如同拔刺那样，去除残存的苦难记忆。

当《归海》变换了几次视角，锚定于袁凤的身上，去打探袁春雨的往事时，小说的真正意图开始如岛屿般显现。“居住”于不同孤岛的袁春雨，她的生活轨迹最终被连成了一条线；她逃出日本人的魔窟，被未来的丈夫王二娃背出枪林弹雨；她住在医院，取代众多崇拜者，成了战斗英雄王二娃的妻子；在忍饥挨饿、灾祸临门的日子里，她辗转腾挪，历尽曲折地活了下来……女性的美好与坚韧，对称着“活着”的不幸与苦难，这是张翎小说一贯的主题，但到了《归海》的时候，可以发现作者在表达技巧与深度上，均有了更为深沉的方式方法。

这是一部充满动荡与不安的小说，但如同荆棘丛中常带看见玫瑰花影一样，《归海》中也有美好的让人忍不住放慢阅读节奏的描写。比如袁春雨与王二娃的温情婚姻，虽无浪漫，却有过命的恩情。他们的家在时代的潮水起伏、破碎，但那份至死相守的情意却令人怀念、向往。这也是受母亲的影响，袁凤对老师孟龙的纯真情感，一样勇敢又动人，最后虽然因为一次黑暗海上的告别而亮整一方夜色，但这段未曾开花便枯萎的恋情，却能够点亮整个小说的色调，让人忍不住畅想：只要时代不是太糟糕，总是会有动心的事发生。

在《归海》中，作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但当仔细寻找时，又丝毫未见踪影，足见张翎在写作这部长篇时所体现出来的掌控力。作者的藏与显、隐与露，决定了一部长篇的精神气质，在小说领域耕耘30多年的张翎，交出了这部就她个人而言技艺最为娴熟、探索最为深邃的作品。《归海》是一个并不太好处理的题材，它并非一部“回乡”故事，它的“战争”主题也并不明显，但这并不影响它在塑造一个丰满故事的同时，也有着犀利表达、钝刀子也有锋芒，锈迹中也可以看到血泪……

古人云“百川归海”，后人只知读出川流与奔涌，殊不知任何川流奔流向海的过程中，都曾跌落悬崖、粉身碎骨。《归海》取其笔触，用轻描淡写的手段，写出了川流中几滴水惊心动魄的旅程，小说并未追求意味深长，但读完之后倍觉意味深长，掩卷之后，人物的惊呼与叫喊仿佛仍在耳畔。



《归海》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春水在工作中。



2020年，水下考古团队在定远舰舱部主炮区发现并成功提取整体重达18.7吨的防护铁甲板。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威海甲午沉舰遗址出土的各式弹药。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丹萍 记者 蒋肖斌

参战约63万人，阵亡超过3万人，这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军的人员统计情况。然而，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各自有着怎样的故事？即便是专业的考古人员，也很难一一说清。

不过，现在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说，在来远舰中有一个三等水手叫于盛元，还有一个一等水手叫张长发。2017—2020年，在位于山东的威海甲午沉舰遗址中，水手身份牌、写有名字的望远镜等被提取发掘，同时还发现大量生活类物品，如瓷碗、皮鞋、麻将、象棋、纽扣等。

在考古的实物证实之下，参战水手们不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鲜活的生命；甲午中日战争不再是一段遥远的历史，而是真切发生过的事实。

10月19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工作进展。作为项目负责人，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春水汇报了威海甲午沉舰遗址的考古情况和成果。

2017年至今，水下考古团队在原本北海军基地威海湾内，陆续发现定远、靖远、来远三舰，发掘出水遗物包括船体构件、船员生活物品和武器弹药等。2020年，团队还在定远舰舱部主炮区，发现并成功提取整体重达18.7吨的防护铁甲板。

对于甲午中日战争，中国人并不陌生。这场发生于19世纪末的战争，最后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甲午中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虽然我们牢记历史，不忘国耻，但对于很多人来说，战争似是一个遥远的“概念”，是在书本上才会看到的内容。在刚刚从事甲午沉舰的水下考古工作时，周春水也只把这当作一个普通的调查，但随着工作的逐步深入，他愈发体会到这项工作的意义。

“在开展甲午沉舰考古调查之前，很多人知道甲午沉舰，但不清楚它们的具体位置和保存状况。”周春水说，通过水下考古，不但清楚揭开每个舰体的面貌，而且让我们感受到与前人的情感联结。

水下考古工作成果为甲午海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例如，史料记载，来远、经远尾后火力不足，战前有奏请加装武器，包括53毫米、120毫米炮。其中，120毫米炮是否加装一直无法确定。周春水介绍，本次考古在来远舰内发现120毫米炮弹实物，同时经远舰内发现120毫米炮弹引信，亦可佐证。此外，来远舰遗址内发现的木质悬梯在紧贴钢板内侧有烧痕痕迹，这证实了战争的惨烈与北洋将士的英勇。

其实从2014年起，甲午沉舰的水下考古工作便已经展开，并在黄海北部甲午海战主战区确认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舰。

周春水介绍，长期以来，甲午沉舰遗址位置并不明确。考古团队首先通过研究分析日本海战史

料、老照片等资料，确定其大体位置；而后运用多种物探探测技术确认沉舰准确位置、淤埋地层情况；同时人工钻探核实遗址堆积、分布、埋深等信息，并作为调查抽沙区域的选择参考；最后进行布方清理，用GPS精准控制抽沙区——通过上述工作方法，完成了对沉舰的考古调查与确认。

“一般来说，发现第一条沉舰是最费功夫的。”周春水说，同一个战区由于大部分沉舰分布相对集中，在发现一条沉舰的同时关注周边，便较容易找到其他沉舰，从而筹备一艘沉舰的调查工作。

10年来，水下考古团队以此接力的方式完成了所有北洋甲午沉舰的考古工作。

在周春水看来，相对于在黄海北部甲午海战主战区的调查发掘，威海湾甲午沉舰遗址的3条主沉舰离岸更近，留传下来的资料照片更加丰富。通过对比照片中的陆岸山体形状，能够为沉舰定位提供参考，圈定出大体位置，减少了搜寻时的工作量。

不过，威海湾甲午沉舰遗址的水下调查发掘，也面临着不少挑战。

战后日本对威海湾甲午沉舰进行过长年打

捞，以致海底沉舰被严重破坏。“黄海北部的沉舰离岸较远，海况较为复杂，打捞难度大，一部分舰体得以保留。”周春水说，威海湾的环境较为优越，且靠近前从的海军基地，可使用的设备较多，打捞难度小。因此，威海湾沉舰遗址保存现状较差，已无舰体形态，海底遗迹、遗物分布呈现被拆解的散落状态：凝结核堆积，木板残断，钢板扭曲。

“这些沉舰不是规规矩矩地待在海底，下去看就好了。”周春水说，它们整体被破坏，舰材散落四地，并被淤泥层层埋藏。

然而，调查、观测沉舰，需要通过抽沙把泥沙清走。想要，军舰的体量很大，埋藏较深，而考古团队一个工作季只有2—3个月的时间。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工作效果最大化，确定工作面是关键。周春水介绍，由于沉舰被完全拆解，没有舰体可以用来推断各舱室位置，考古团队便在舱部、中部、艉部3个区域，布设探沟，进行解剖清理。

能见度差是威海湾甲午沉舰遗址水下考古工作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工作人员在水下考古时基本上是摸黑作业，通过差分GPS定位和水下三维声呐全景扫描等技术克服困。

大禹治水的真相，藏在黄河变迁的历史中

□ 辛德勇

黄河河道的变迁，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古史上发生的重大“事变”。

狭义的“历史”，指的是人类社会随着时光流淌而发生的演变。在这一意义上，河流水道的变迁，其本身是算不上历史事件的。然而地理环境是人类历史活动展开的舞台，黄河是出演中国历史这出连台大戏的重要场景。黄河流量这么大，流程这么长，使河水变浊变黄的泥沙又那么多，致使这条河道往哪里流，以及滔滔河水怎么淌，都会对这出大戏的剧情产生重要影响。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黄河河道变迁幅度之大、频度之高，对于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超乎想象的。近日我在三联书店出版的《简明黄河史》，其中最核心、最基础的内容，就是叙述黄河河道的变迁史，当然在此基础之上也扼要地叙述了黄河的水利和水患，还有在贯穿整个历史时期的黄河流域范围内所发生的文明，以及所展开的典型事件。

我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帮助非专业的读者更加全面、具体地了解黄河、认识黄河；同时也真诚地希望这本小书能够让更多的专业历史研究者更好地了解和把握黄河对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许多重大问题的影响（隔行如隔山，其实大多数专业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对历史地理知识的了解都是相当有限的）。

黄河河道变迁基本原理：水往低处流

黄河河道在历史时期的变迁过程虽然极为复杂，但是其基本原理却很简单——“水往低处流”。

通过黄河入海口所在的位置，我们可以非常简便地了解黄河河道变迁的大致范围：黄河入海口最北可达今天津附近，最南可达今淮河尾间。例如，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到清代咸丰五年，长达700多年，黄河下游一直是袭夺淮河下游河道而流入黄海，同现在流入渤海河道大不相同。这意味着现在的海河和淮河，在历史时期都曾经是黄河的一部分。因而通观整个历史时期，北起海河、南到淮河这一广阔地域（这也就是辽阔的黄淮海平原）就构成了一个很大的黄河下游流域。

在这一流域范围内，黄河的下游河道，就是遵循着“水往低处流”的规律，哪一边低洼往哪一边流淌。

听我这样讲，很多人一定会问：河道既然流往低洼地带，就一直在那里流好了，怎么流着流着又会改道往别的地方流呢？这不是由低地改流到高地去吗？当然不是，自然规律不会改变，黄河水依然是向低处流，而且正是因为要往低处流，河道才会发生改移。

这就涉及河流水文另一重要特性，这就是“沙淤地高”。所谓“沙淤地高”，包括两重含义。



黄河 视觉中国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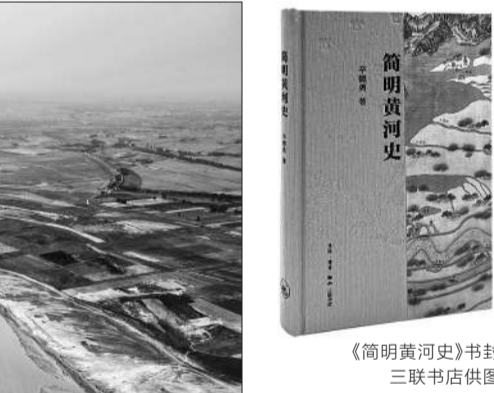
任何一条河流，河水中都会含有一部分泥沙，各个河段汇入的水流，在淌过地面时必然要把泥沙裹挟到水中。一般来说，在上中游河段，由于河道坡降较大而导致水流湍急，这些泥沙只是顺流而下，不会在河床里沉淀下来。可是到了下游河段以后，河道变得相当平坦，流速随之转缓，水中的泥沙就逐渐沉降下来，淤积到了河床上面——这是所谓“沙淤地高”的第一重含义。

随着河床不断淤高，河面与两岸大堤之间的高差就会愈来愈小。这样，在洪水来临的时候，河水就很容易溢出河堤，漫流到两岸地面之上。当然，更容易发生的是洪水直接冲开大堤的薄弱之处，造成溃决，这样便会有更多的河水四处漫流。在辽阔地面上漫流开来的水流，流速自然很快降低，泥沙就在水到之处大量沉积下来，造成广泛区域的地面普遍增高——这便是所谓“沙淤地高”的第二重含义。

在整个黄淮海平原这个黄河下游区域内，黄河的河道，就是依着“水往低处流”和“沙淤地高”这两项规律，不断地发生着河道的迁改：茫茫平原上，总有那么一个地带，地势会相对低一些，因为“水往低处流”，滔滔黄河水就顺着此处低洼地带流向了大海；然后是“沙淤地高”，这个地带高了，水流就再去另找某个相对低洼的地带，再来一次新的“水往低处流”。像钟摆一样，来来回回，往返在大平原的南北——除了以泰山为中心的鲁中山地，这里太高了，河水只能在它的南北两侧绕行。

大禹治水之前，黄河很规矩吗

黄河河道变迁的特殊性，是由于它所流经的区域相当特别，这一因素使得黄河河道变迁的剧烈程度大大高于其他大河的下游河段。之所以说黄河流经的区域相当特别，是指它的中游地段是在黄土高原核心地带流过的，这里的黄土层不仅非常深厚，还普遍发育着垂直节理（就是大白话讲的“竖茬”）。黄土层的深厚为河水冲刷提供了巨量



《简明黄河史》书封 三联书店供图

的沙源，垂直节理的结构形式则使得这些黄土极易被水流冲刷下去；再加上这一区域在夏秋间高度集中的降雨，会对地表造成强烈的冲刷，这样就使得黄河中游区域带给下游河段的泥沙极为丰富，无疑大大增强了下游河道决徙迁改的强烈程度。

我在上面讲述的这些情况，是对有文献记载以来情况的概括。在这当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从战国中期起，人才在黄河下游两岸筑起连绵千里的夹河大堤。在这之前，河道变迁的原理相同，只是没有大堤的束缚，河道的迁改会更加为频繁而已。

人类在具有一定改造自然的能力之后，就出现了利用黄河和改造黄河的问题。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这方面最早的记载。

长久以来，学术界相当普遍地把大禹治水的背景理解为一场规模空前、范围广大的洪水。意思就是在此之前，黄河水在一条固定的河道里规规矩矩地流淌，河流两岸则是牧歌式的田园，没有水灾，没有水害，平静而又安详。为了论证这场超常洪水的真实性，很多人还联系起西方那个诺亚方舟的故事，以为这是地球的东方和西方同时遭遇的全球大洪水。学者们不仅这么想了，还通过考古学家的手铲找到一些所谓地层的“证据”。

然而，这符合自然的规律吗？我未必必。从黄河河道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原理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人类文明社会的早期，人口还没有太多，能力也还很弱，所以只能被动地躲避黄河的洪水。在这种情况下，黄河下游河道在洪水季节的泛滥，必定是经常的、反复不断的，从来就没有太平过，不是某一场特别的洪水。

除了这种经常性的泛滥以外，还必然会会出现下游多股河道长期并存、且这些多股并存河道，黄河夺淮东南流入黄海期间，由于无人治理，就长期处于这样的状态，仿佛重回洪荒上古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洪水时期四下漫溢的洪水还会在低洼之处聚而成湖，形成无数大大小小的水泊。

这就是古昔先民在黄河下游区域所处的原始环